

李存山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B223.12
20

智慧之门

李存山
注译

老子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李存山注译.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1
(智慧之门)
ISBN 7-5348-2279-3

I. 老… II. 李… III. ①道家②老子-注释③老子-译文 IV. B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62298 号

责任编辑:卢海山

责任校对:温向苏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新星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6.125

字数:138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5348-2279-3/G·510 **定价:**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导

言

中国文化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自秦以后形成“儒道互补”的格局。儒家传统与道家传统都源远流长，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而且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儒家传统与道家传统的延续，都离不开其具有原创性的经典。儒家的经典是《五经》、《四书》，道家以及道教的经典则是《老子》、《庄子》和《列子》等书。《老子》又称《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也是道教所尊奉的“第一经典”。其影响又不仅在于道家和道教，它是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产生的一部伟大经典，它是中华民族的，也是中华民族所贡献于世界的（《老子》是世界上翻译最多、影响最大的文献之一，其英译本就达百种以上）。

《老子》的作者是春秋时期与孔子同时而比其年长的老子，但这一点自西汉初年就已



有些扑朔迷离，“世莫知其然否”。近代以来，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迄至今日，尽管有了“地下之新材料”和传世文本的“二重证据”，但笼罩在《老子》上的疑云并没有完全消去。以下就老子其人其书及其基本思想作一介绍。

一、老子其人：“其犹龙邪”？

司马迁在《史记》中作有《老子列传》，其首段云：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苦县在春秋时期本属于陈国，后来楚灭陈，遂属于楚国，在今河南省鹿邑县东。“周守藏室之史”，就是东周朝廷里掌管藏书的官员。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所以老子又称李耳、李聃或老聃。“老子”是尊称，但为什么李耳被尊称为“老子”而不称为“李子”呢？一说“老，考也”，“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也就是说，因为老子长寿，故称为老子，甚至有的说老子“生而皓首，故称老子”；另一说，老子原姓老，老之变李，是因为老、李音近或音同，语转而然。至于“聃”字，又作“耽”，《说文》云：“耽，耳大垂也”，“聃，耳曼也”。段玉裁《注》：“耳曼者，耳如引之而大也。”虽然老子原姓老的可能性较大，但“老子”或“老聃”在历史上给人们留下的形象就是一个长寿、大耳的老者。

《史记》的传本中又有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聃”。《史记》索隐云：“有本‘字伯阳’，非正也。然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字伯阳”是后人加进《史记》的，其原本并不如此。《吕氏春秋·重言》篇云：“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高诱注：“老聃学于无为而贵道德，周史伯阳也，三川竭，知周将亡，孔子师之也。”关于周史伯阳父论“三川竭”、“周将亡”，见于《国语·周语上》，时在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此



距孔子有二百多年，老子并非伯阳父是可以肯定的。至于说老子是舜的老师伯阳（《吕氏春秋·当染》：“舜染于许由、伯阳。”高诱注：“伯阳，盖老子也，舜时师之者也。”），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高诱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家，可知老子在汉代已经被神化，以致后来成为道教的“道德天尊”、“玄元皇帝”、“太上老君”。除了神话之外，老子在正史中也仍有一些谜团。

关于孔子师事老子，《史记·老子列传》有记载：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对周礼应该十分了解。孔子以继承周礼为自己的文化使命，他去东周向老子问礼，是情理中的事。老子是如何向孔子传授周礼的，《史记》中没说，而载老子把孔子教训了一顿，告诫他要“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孔子对老子的告诫是怎么表示的，《史记》中也没有说，似乎孔子对此告诫并不反感，而对老子其人尤其感到高深莫测。他说，我知道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走，也知道如何对付它们，但龙“乘云气而上天”，我就不能知道了，老子“其犹龙邪”？

有学者考证，《史记》中关于孔子向老子问礼的记述，可能本之于《庄子》。在此书的《天道》篇中有这样的话：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微藏史有老



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六经》（“六”原误作“十二”）以说。

此书的《天运》篇又讲：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噤。予又何规老聃哉？”

沛在当时为宋地，此与“孔子适周”之说不同。但此记孔子说“吾乃今于是乎见龙……乘云气而养（翔）乎阴阳”，与《史记》的记载相似。司马迁是否把《天道》篇和《天运》篇两处所说合在一起了呢？《庄子》书中还有多处讲到孔子与老子的交往对话，这里就不俱引了。

《史记》中还有两处对孔、老关系的记载。一处见于《孔子世家》：

鲁南官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孔子世家》记此事是在孔子十七岁至三十岁之间，后来边韶《老



子铭》、酈道元《水经注》都说“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另一处见于《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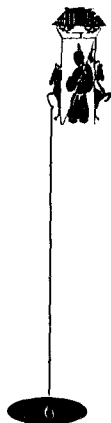
看来，司马迁对于孔子曾经师事老子是深信不疑的。但也有学者说，《庄子》书中“寓言十九”，多无实事，司马迁相信了“庄周之徒所捏造”，“杂凑了许多材料，并没有加考辨”，“不足信也”^①。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曾经师事老子，不仅见于道家 and 史家的文献，而且也见于儒家的文献。如《礼记·曾子问》载曾子、子夏向孔子问丧礼，孔子在回答时有四处提到“吾闻诸老聃曰”，其中一处说：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堽，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堽，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左，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注：堽，墓地的道路。）

此处提到的“巷党”可能是鲁国的地名，而“日有食之”与《春秋经》记鲁昭公七年“日有食之”相合，这一年孔子正是十七岁。但《春秋经》记昭公世的日食凡七次，孔子在哪一年、何地向老子问礼，仍不能确定。如果按《庄子·天运》篇所说孔子五十一岁“见老聃”，而那一年并无日食，与此相近的是鲁定公十五年，即孔子五十七岁时有日食。

^① 孙次舟：《跋〈古史辨〉第四册并论老子之有无》，《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6、93页；唐兰：《〈老子〉时代新考》，《古史辨》第六册，第605页。



除了《礼记·曾子问》之外,在《孔子家语》的《五帝》篇和《执轡》篇也有两处提到孔子说“昔丘也闻诸老聃曰”,《韩诗外传》卷五中也记子夏说“仲尼学乎老聃”。可见,虽然孔子何时、何地、几次向老子问礼,并不能确定,但有此事实是儒、道两家都承认的。唐代的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对此提出批评:

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云耳。”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韩愈否认孔子曾经师事老子,是出于建立儒家道统说的需要,而没有历史的根据。近代以来亦有学者否认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其证据只说明“其年难定”、“其地无据”,而不能说明实无此事。

《史记·老子列传》还有《老子》之成书的记载: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对这段记载也有些疑问。首先是“至关”的“关”是哪个关。一说是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一说是散关,在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一般认为此指函谷关为是,但清代学者汪中在《老子考异》中指出,函谷关之置是在战国时期秦献公之世(献公元年为公元前384年),这已是孔子去世(公元前479年)近一百年以后了。其次是“关令尹喜”为何时的人物。此人一般被称为关尹或关尹子(一说关令尹即守关的关吏,名喜;一说姓关名尹,“关令尹喜曰”本无“令”字,意谓关尹喜悦而发言。此姓



名的疑问无关宏旨,可以不论)。《庄子·天下》篇云: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

此处不知为什么把关尹列在老聃之前。《庄子·达生》篇、《吕氏春秋·审己》篇和《列子·说符》篇等都记关尹与列子同时,而《庄子·让王》篇和《列子·说符》篇又都记列子与“郑子阳”同时。此“郑子阳”一说是郑相子阳,而郑相子阳据《史记·郑世家》是在郑繻公二十五年(公元前398年)被杀,这已接近秦献公之世了;一说是郑君子阳,即《韩非子·说疑》篇“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的子阳,此子阳在史书上没有留下确切的年代,但《庄子·应帝王》篇和《列子·天瑞》篇等又记列子师事壶丘子林,与伯昏无人相友,据《庄子·德充符》篇和《吕氏春秋·下贤》篇,壶丘子林、伯昏无人与子产同时,而《左传》明确记载子产与孔子同时。如果依前一说,老子见关尹就不可能了;而依后一说,则子产、关尹、列子均与孔子同时,老子“至关”而见关尹,“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是可能的。

《老子列传》又说: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德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史记》正义云:“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故书之。”其实,司马迁未必怀疑“老子或是老莱子”,因为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已明列老子与老莱子是两个人,而且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德之用”与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也不相合。但司马迁为什么要在《老子列传》中提到老莱子呢?有学者认为这只是“附见之耳”,与慎到、田骈、公孙龙、墨翟等“附见于《孟子荀卿列



传》同义”^①。但“附见之”不应插在老子传记的中间,其真实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有人怀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所以司马迁记上了这个“或曰”。

《老子列传》中又有对老子享寿多少年的“或言”: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如果说老子活了一百余岁,尚有此可能;如果说老子活了二百余岁,就有些神化了。二百余岁的“或言”又是与接下来的一段记载相联系的: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关于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在《史记》的《周本纪》和《秦本纪》中都有记载,时在周烈王二年、秦献公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374年,因此,这不是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而是一百零五年的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如果“儋即老子”,那么老子就是活了二百余岁了。当时的人们“莫知其然否”,但近代以来的学者则可以肯定春秋时期的老子绝非战国时期的太史儋。然而,因为对孔子是否曾经问礼于老子有疑问,又因为对老子“至关”的“关”是何时设置、“关令尹喜”是何时的人物有疑问,所以“儋即老子”就有可能了;当然,说“儋即老子”已不是指春秋时期的老子,而是说著《老子》上下篇的老子即战国时期的太史儋,清代的学者汪中在《老子考异》中就已持这样的观点,现代的

^① 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古史辨》第六册,第461页。



学者则有谓汪说“要为千古卓识”^①。

《老子列传》说：“老子，隐君子也。”“隐君子”就是隐士，这与老子先为周守藏室之史，后来“免而归居”或“见周之衰，乃遂去”的身份相符合。也可能正是因为老子之“隐”，史迹不详，所以《老子列传》中才留下了这些疑问。《老子列传》接着有对老子后代的记载：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这段记载仍留下了疑问。“段干”是魏国的地名，而老子之子“宗”封于段干，此人当即《战国策·魏策三》和《史记·魏世家》中所记的“段干崇”或“段干子”（“宗”与“崇”古音同而通用），《魏策三》和《魏世家》记魏王派段干崇向秦割地讲和是在魏安釐王四年、秦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 273 年），此时距孔子去世已二百多年，所以段干宗不可能是老子的儿子，而与太史儋的年代稍接近，故有可能是太史儋之子^②。“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若此则“解”为老子的八代孙，而与“解”同时的孔安国已是孔子的十三代孙。老子既年长于孔子，则其八代孙与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③。因此，关于《史记》对老子世系的记载，要么是认为不可据信，要么是把老子世系每代之间的时间拉长，或将其中的

① 钱穆：《老子辨》，大华书局，1935 年，第 8 页。

② 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古史辨》第六册，第 473 页。

③ 梁启超：《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306 页。



“玄孙”解释成“远孙”(这样就多出了几代)^①,再就是认为司马迁误把太史儋的世系作为老子的世系了。

司马迁生当汉初,去古未远,他当时对老子其人的了解当比后世学人了解得更多。但当时老子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世莫知其然否”的传说,司马迁是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精神撰写了《老子列传》。仔细分析起来,司马迁基本上肯定了春秋时期的老子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但对当时的一些“或曰”、“或言”也没有做出或是或非的明确判断,而采取了“存疑”的态度。这样就给后人留下了种种疑问,备下了种种争端。孔子说,老子“其犹龙邪”?“龙”的形象一是有些神奇、高远,一是有些飘渺、隐逸。我们现在虽然是把老子作为一个平实而伟大的思想家,但也应该承认,受史料所限,老子周围的疑云还不能全然消去。

二、《老子》其书:成书年代的争论

20世纪20、30年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和撰写“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影响,学术界对老子其人其书的问题,进行了一次集中的讨论,主要的文章被收入当时出版的《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中。如上所述,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对老子之事迹和《老子》之成书的记载留下了一些疑问,而在现代的学术背景下,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关键在于《老子》之成书是在什么年代,因为这个问题不明,先秦时期的学术思想谱系就难以确定。

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按蔡元培在“序”中所说,此书的“特长”有四:“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这四个“特长”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以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其中“扼要的

^① 张熙:《梁任公提讼〈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古史辨》第四册,第312~313页。



手段”，即“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

梁启超在 1922 年写了一篇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论，其中对老子其人其书提出了六点疑问：第一，《史记·老子列传》记老子八代孙与孔子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第二，墨子、孟子极好批评，但对老子思想“始终不提一字”；第三，孔子向老子问礼，与《老子》五千言的精神不合；第四，《史记》的记载大部分取材于《庄子》，而《庄子》大部分是寓言，不可据信；第五，从思想系统上论，老子的话太自由，太激烈，不大像春秋时人说的；第六，从文字语气上论，“王侯”、“万乘之君”、“仁义”、“取天下”等不像是春秋时人所有。据此，梁启超认为，“老子这部书或者身份很晚，到底在庄周前或在其后，还有商量余地。”^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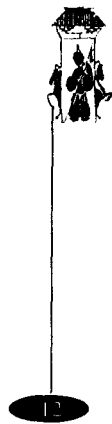
对于梁启超提出的六点疑问，有赞成者，也有反驳者。当时张煦就作了一篇《梁任公提讼〈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对这六点逐一进行反驳，指出“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嫌疑”^②。张文之后，顾颉刚、钱穆、张寿林、唐兰、黄方刚、罗根泽等学者陆续发表文章，众说纷纭，争执不下。

1931 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此书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同，是“自孔子讲起”，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关于《老子》一书，冯书是将其置于孟子、杨朱之后。冯先生说：

《老子》一书……系战国时人所作。关于此说之证据，前人已详举（参看崔东壁《朱泗考信录》、汪中《老子考异》、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兹不赘述。就本书

① 梁启超：《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古史辨》第四册，第 307 页。

② 张煦：《梁任公提讼〈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古史辨》第四册，第 312 页。



中所述关于上古时代学术界之大概情形观之，亦可见《老子》为战国时之作品。盖一则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论语》。二则《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三则《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若只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词”(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①

冯先生的这段话，虽然留下了被讥为“聚蚊可以成雷”的口实，但却讲明了关于《老子》一书争论的一个实际情况，即：对《老子》一书有种种疑问，争论即由这些疑问而起，认为《老子》一书晚出者是把这些疑问“合而观之”，从而作出其晚出的推断；但这些疑问“分而观之”，毕竟还是“疑”，而不是必然的证据，所以认为《老子》一书早出者即可对晚出的“证据”逐一进行反驳，从而认为晚出说不能成立。

冯著出版的当年，胡适就写了《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对其所举“三端”及梁启超的六点疑问进行了逐条反驳。随后，胡适又写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其中特别针对“丐词”说指出：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并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已承认的‘丐词’，究竟是‘丐词’，不是证据”。胡适在此文的结束语中说：

我至今还不曾寻得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有必须移到战国或战国后期的充分证据。在寻得这种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延长侦查的时期，展缓判决的日子。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0页。



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①

应该说,胡适的这种态度是较为客观的。当时参加争论的各方,不管是否同意胡适的“展缓判决”,实际上也只能提出种种“假说”或“假定”,而不可能得出证据确凿、足以说服对方的定论。

从1919年到1936年,关于《老子》一书的争论空前热烈,《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收入了当时论辩的主要文章。这两册的主编罗根泽在“自序”中说:

关于考据《老子》年代的文章,止第四册及本册所收,就有三十五六万言,真是有点小题大作。不要说旁观者望而却步,当事者也见而生畏。但《老子》的年代问题,究竟是需要解决的,除非将先秦的学术束之高阁,否则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一切都发生障碍。^②

后面的话实际上已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并非“小题大作”。在“自序”的最后,罗根泽列举了宋代、清代和当时学者对老子其人其书的二十九种见解(方括弧内文字为笔者所加):

(一) 陈师道:老子在关[尹]、杨[朱]后,墨、荀间。

(二) 叶适:著书之老子,非孔子问礼之老子。

(三) 黄震:《老子》书作于隐士嫉乱世而思无事者。

(四) 宋佚名:同于叶适。

(五) 吴子良:著书之老子,即孔子问礼之老子。[以上宋代]

① 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古史辨》第六册,第410页。

② 《古史辨》第六册“自序”,第1页。



(六) 毕沅:孔子问礼之老子,即太史儋。

(七) 汪中:老子即太史儋,在孔子后。

(八) 崔述:春秋时有老聃,但孔子并没有向他问礼,《老子》书是杨朱之徒的伪托。

(九) 牟廷相:老子在周称伯阳父,在春秋称老聃,至战国称太史儋,《老子》书作于战国。[此说荒诞,可以不计。]

(十) 康有为:《老子》书在孔子后。[以上清代]

(十一) 梁任公[启超]先生:《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

(十二) 张怡荪[煦]先生:《老子》书无产于战国嫌疑。

(十三) 唐立厂[兰]先生:老聃确长于孔子,《老子》书是老聃的遗言,撰成在《墨》、《孟》撰成的时期。

(十四) 刘泽民[汝霖]先生:教孔子者是老聃,辑老聃格言为《老子》书者是[战国时期的]李耳。

(十五) 张仁父[寿林]先生:《老子》著作的时代在孟子前后。

(十六) 钱宾四[穆]先生:《老子》成书于宋钎、公孙龙同时或稍后,作者大概是詹何。至孔子问礼的老子是老莱子,即荷蓀丈人。

(十七) 张西堂先生:《老子》书成于《庄子》内篇后。

(十八) 黄方刚先生:老子长于孔子;《老子》书成于孔子时。

(十九) 冯芝生[友兰]先生:老聃与李耳非一人;《老子》在孔、墨之后。

(二十) 张季同[岱年]先生:《老子》书是战国初期的产品,老子思想在孔、墨之后,杨朱、慎到、申不害、孟子、庄子之前。老子有是太史儋的可能。

(二十一) 顾颉刚先生:老聃是杨朱、宋钎以后人;《老子》书成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间。

(二十二) 胡适之先生:孔子确曾向老子问礼,《老子》书